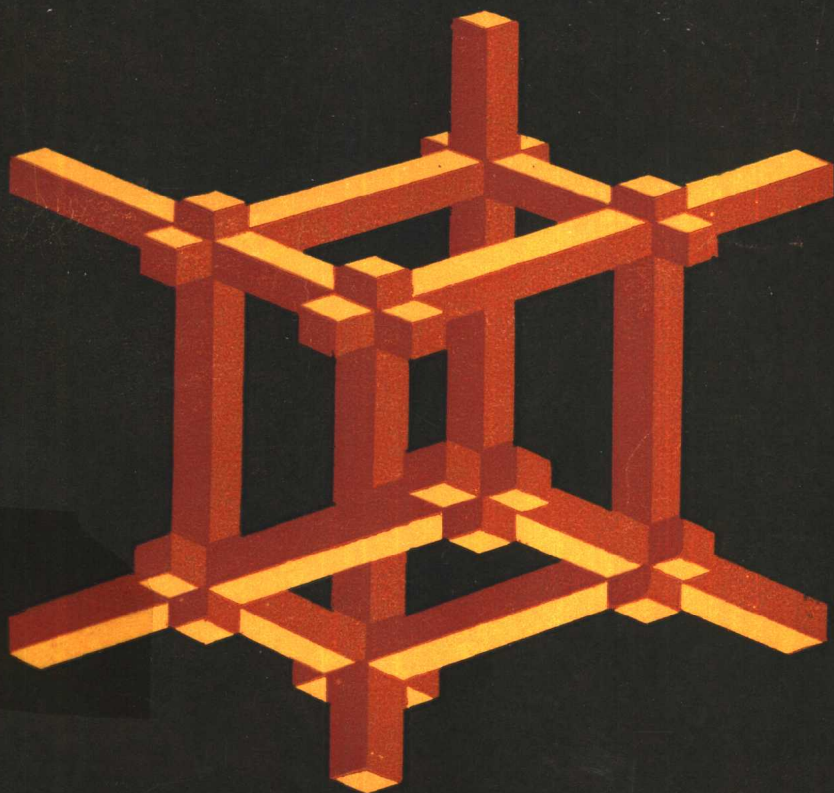


无穷的探索

思想自传

卡尔·波普尔 著



020572

无 穷 的 探 索

——思想 自 传

卡尔·波普尔 著

邱仁宗 段 娟 译

舒炜光 校

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

1983·福 州

无 穷 的 探 索

——思想自传

卡尔·波普尔 著 邱仁宗 段娟 译

舒炜光 校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9.375印张 2插页 224千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书号：2173·30 定价：1.25元

本书以《卡尔·波普尔的自传》为题初次发表于保尔·阿瑟·施尔普编《在世哲学家文库》的《卡尔·波普尔的哲学》一书中，美国伊利诺州奥本·克特出版社1974年版。

修订版1976年由英国格拉斯哥的威廉·科林斯父子有限公司的方塔纳出版社第一次印刷。

第二次印刷，1976年10月。

第三次印刷，1977年6月

第四次印刷，附有勘误，1978年10月。

“……思想史的一篇卓越文献。”

——刘易斯 S·费厄维尔

“没有一个用英语写作的哲学家，
在他工作的范围和质量方面，能与卡
尔·波普尔相匹配……政治、科学、艺
术……事实上，人类思想的宽广领域很
少没有受到波普尔的工作照耀的。”

——布里安·麦基

“这本自传一部分是讨论方法；一部
分是波普尔主要思想的发展史；又一部分
是继续讨论他正在全神贯注的想法。”

——蒂勒尔·伯吉斯，《新社会》

“……对这个人及其思想的杰出介
绍。”

——马丁·伽德纳，《新领袖》

译者前言

卡尔·波普尔是当代颇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科学哲学和社会政治哲学对西方科学界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他的哲学的研究和批判也日益得到重视。

卡尔·波普尔生于1902年，出身于奥地利犹太裔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对哲学、科学、音乐有兴趣。1918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哲学、数学、物理学、医学、心理学。1928年以心理学方法论的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因希特勒排犹，迁居新西兰。大战结束后移居英国，任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哲学、逻辑、科学方法系教授、主任，入英国籍，获爵士称号。1969年退休。从50年代起一直住在乡间小镇潘恩至今。这本自传的题目叫《无穷的探索》，反映了他一生的主题，这是一本讲他的学术思想如何发生、发展、变化的传记。对于研究和批判他的思想的学者，以及所有对他的学说感兴趣的人，这本传记是必须读的，也是值得一读的。

波普尔作为一个哲学家在科学（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界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本人对数学、物理学、生物学都有较深的造诣。他在概率论上发展了概率的趋向性解释；在物理学上坚持实在论的观点，反对主观主义的解释；在生物学上提出了补充达尔文主义的假说；在科学方法论上发展了否证主义，提出了演绎检验法，表述了科学理论评价逻辑；在认识论上提出了知识成长理论、客观知识理论和逼真性理论；在社会政治理论上提出了反权威主义、社会渐进工程学和开放批判的主张。

西方的某些著名科学家对于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十分赞赏。英

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生物学家梅多沃说：“我认为波普尔是有史以来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哲学家。”英国天文学家邦迪说：“科学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就是波普尔所说的。”法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分子生物学家莫诺公开承认波普尔对他工作的影响。奥地利心理学家贡布里希说：“如果波普尔教授的影响在这本书（《艺术和幻想》）中到处感到，我将引以自豪。”澳大利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生理学家艾克斯说：科学家应该“阅读和思考波普尔关于科学哲学的著作，并作为他们科学生涯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有些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他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的实际并不符合。当波普尔六十寿辰时，29位著名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物理学家布里奇曼和艾克斯在内）和哲学家发表文章评述他的思想作为纪念，编者、加拿大物理学家和哲学家邦格在序言中说：波普尔“已被公认为当代最具独创性、最深刻、最严谨以及最为多才多艺的思想家”，“波普尔的追随者和他在学术上的对手都对他怀有极大的尊敬。”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波普尔的思想和学说中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他对马克思主义怀有成见，使他不能把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他全盘否定归纳法，避开对科学理论发生学的研究，使他离开了科学的实际；他对科学基本上仍然是一种陈述观点，使他仍然脱不开“逻辑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巢臼”，他过分强调否证和否认理论发生中的理性作用，使他的哲学潜藏着非理性主义的因素。因此，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该采取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态度。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邱仁宗 段 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1983年4月29日

致 谢

这本自传起初是《卡尔·波普尔的哲学》两卷集的一部分。该书由保罗·阿瑟·施尔普编辑，作为《在世哲学家文库》第14卷第1和第2册出版（伊利诺州拉塞尔：奥本·克特出版公司1974年版）。正如这个文库的所有文章一样，这本自传应归功于文库的创办人，施尔普教授的倡议。我对于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对于他为我的自传从1963年等到1969年的无限耐心表示万分感谢。

我对恩斯特·贡布里希、布里安·麦基、彼特森、杰勒米·谢默尔、帕米拉·瓦茨夫人，尤其对戴维·米勒和我的妻子，在阅读和改进我的手稿时的耐心深表谢意。

在初版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只是在校对了长条校样之后，由于一些技术上的原因，才不得不决定把注释收集在每篇文章之末。（因为手稿是按照把注释作为脚注印在有关各页底部而准备的，所以这并非是无要紧要的。）

在最初的《在世哲学家文库》版本出版期间，尤金·弗里曼教授，安·弗里曼夫人以及他们的编辑人员作了大量工作，我愿在此对他们的帮助和照顾再次表示感谢。

这一版的本文作过修改，作了少量增补，有一段从本文中删除，合并注20中。

卡尔·R.波普尔

白金汉郡潘恩

1975年5月

目 录

致谢

1. 无所不知和可错性·····	1
2. 童年的回忆·····	2
3. 早期的影响·····	4
4. 第一次世界大战·····	8
5. 早期的一个哲学问题：无限性·····	10
6. 我在哲学上的第一次失败：本质论问题·····	12
7. 关于本质论的一大段离题话：使我和大多数当代哲学家 仍然分道扬镳的是什么·····	14
8. 关键性的一年：马克思主义，科学和伪科学·····	28
9. 早期的研究·····	36
10. 第二段离题话：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没有归纳的学 习·····	42
11. 音乐·····	52
12. 对复调音乐起源的思索：发现的心理学还是 发现的逻辑？·····	54
13. 两种音乐·····	60
14. 艺术，尤其是音乐的进步论·····	69
15. 在大学的最后几年·····	74
16. 知识理论：《研究的逻辑》·····	81
17. 是谁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	90

18. 实在论和量子论·····	93
19. 客观性和物理学·····	100
20. 真理；概率；确认·····	102
21. 战争迫近；犹太人问题·····	109
22. 流亡：英国和新西兰·····	113
23. 在新西兰的早期工作·····	116
24. 《开放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119
25. 在新西兰的其他工作·····	125
26. 英国：在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	126
27. 在英国的早期工作·····	131
28. 初访美国，会见爱因斯坦·····	133
29. 问题和理论·····	139
30. 与薛定谔的争论·····	142
31. 客观性和批判·····	145
32. 归纳，演绎，客观真理·····	148
33. 形而上学研究纲领·····	156
34. 反对物理学中的主观主义、量子力学 和趋向性·····	159
35. 玻耳兹曼和时间之矢·····	164
36. 主观主义的熵理论·····	171
37. 作为形而上学研究纲领的达尔文主义·····	176
38. 世界3或第三世界·····	190
39. 身心问题和世界3·····	198
40. 价值在事实世界中的地位·····	204
注释·····	209
主要著作目录·····	258
索引·····	268

排除什么？提出什么？那就是问题

休·洛夫廷：

《都利特尔医生的动物园》

1. 无所不知和可错性

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跟维也纳一位名叫阿达尔伯特·波什的家具木工老师傅当学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从1922年到1924年，我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他的相貌酷似乔治·克莱孟梭，但却是一个非常温和而又善良的人。我取得了他的信任后，每当工场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时常给我传授他那无限渊博的知识。有一次，他告诉我，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制作各种永动机的模型，并且若有所思地说：“他们说，你是不会成功的，但是一旦成功的话，他们的说法就不一样啦！”他特别喜欢问我历史问题，当我确实答不上来（虽然我这个徒弟是个大学生——这是一件使他非常自豪的事。）时，他就自作回答。他会问：

“你知道是谁发明了长统马靴吗？不知道吧，是弗德兰的公爵沃伦斯坦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发明的。”在他自己提出一两个更难的问题，并由他自己得意洋洋地解答后，我的师傅便会以朴实的自豪神情说：“好啦，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问题，我什么都知道。”

我相信，从我亲爱的无所不知的师傅阿达尔伯特·波什那里学到的知识理论，比从我的其他任何老师那里学到的更多。除了我的师傅以外，没有任何人那么多地影响我成为一个苏格拉底信徒。因为正是我的师傅使我不仅懂得我是多么浅薄无知，而且懂得我所追求的任何智慧，只能在于更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是无限的。

每当我在制作一张写字台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充满了属于认识论领域的形形色色想法。那时我们承担了制作三十张带有许许多多抽屉的两头沉的红木写字台。我担心，由于我专心于认识论，其中一些写字台的质量，尤其是法国式磨光的质量会受到严重影响。我的师傅提出过这一点，并且这也使我深深认识到：对于这类工作，我太无知，太容易出错了。所以我决心在1924年结束我的学徒生活，我应当寻找某种比制作红木写字台更容易的工作。有一年的时间，我从事于教育那些无人管教的孩子的社会工作，我以前干过这种工作，并发现十分困难。然后在我用了五年多的时间主要从事学习和写作后，我结婚了，并且找到了一个中学教师的工作，幸福地安居下来。这是在1930年。

那时，除了教书以外，我没有职业上的抱负，虽然1934年末，在我出版了我的《研究的逻辑》一书后，我对教学工作有些厌倦了。所以在1937年我有机会放弃教学工作并成为职业哲学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那时，我已快35岁了，我想我终于解决了如何制做写字台的问题，然而我还是全神贯注于认识论。

2. 童年的回忆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日子和地点——我是1902年6月28日出生在维也纳上圣伐伊特区的一个名叫希梅尔霍夫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智力生涯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开始的。就我的哲学思想发展经过来说，我记得它的一些早期阶段。但它确实比我的感情和道德发展要开始得晚。

我觉得，当我是一个儿童的时候，我有些清教徒的味道，甚至

是古板的，虽然这种态度的养成也许是由于我感到我无权参予评价除我以外的任何一个人。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是羡慕我的长者和强者的感情，例如，我羡慕我的表兄艾里克·施夫，我非常羡慕他比我大一岁，羡慕他的整洁，特别是羡慕他的漂亮的相貌；我总是把漂亮的相貌看成是重要而又难以得到的天赋。

现在人们经常会听说儿童生性好恶。我不相信这说法。当我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我就是美国人所说的那种“多愁善感的人”，而同情又是我所记得的最为强烈的感情之一。我最初经历⁹的爱的主要成分就是同情，这次经历发生在我4~5岁的时候。我被送进幼儿园，幼儿园里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双目失明。她的迷人的微笑，她的双目失明的悲剧，两者都使我的心碎了。这真是一见钟情。虽然我只见到过她一次，而且仅仅只有一两个小时，但我永远忘不了她。后来再也没有送我到这个幼儿园去；也许我母亲注意到了我那时多么心烦意乱。

当我还是一个幼小儿童时，维也纳一贫如洗的景象是使我焦虑不安的主要问题之一——以致它几乎总是在我的脑海里。现在生活在西方某一个民主国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本世纪初贫困意味着什么：男女老少饥寒交迫，希望渺茫。然而我们儿童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几个铜板去送给那些穷人而已。

只是在多年之后，我才发现我父亲早已为挽救这种局面而长期努力工作，虽然他从来没有谈起这些活动。当时他在两个委员会工作，这些委员会是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一个是共济会分会，管理一个孤儿院，他多年来一直是这个分会的会长，而另一个委员会（不是共济会的）则为无家可归的成年人和流离失所的家庭建立和管理的一个庞大机构。（阿道夫·希特勒，早期呆在维也纳期间就是收容在后面这个机构——“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中的一个。）

我父亲这项工作得到了出人意料的重视，那时老皇帝封他为弗朗西斯·约瑟夫等级的爵位，这不仅是件必定使人大吃一惊的事，而且必定是个问题。因为虽然我的父亲——象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尊敬皇帝，但他却是一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学派的激进自由主义者，而根本不是一个政府的支持者。

作为共济会会员，他甚至还是当时被奥地利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一个团体的成员，尽管弗朗西斯·约瑟夫的匈牙利政府没有这样宣布。因此，共济会会员们经常越过匈牙利边界在普雷斯堡（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去接头。奥地利帝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但并不受两个议会控制：它们无权罢免两位首相或解散两个内阁，甚至靠投不信任票也不行。如果可以作一比较，那末，奥地利国会看来似乎比威廉和玛丽统治下的英国国会更加软弱无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牵制和平衡，有的只是严厉的政治审查；例如：我父亲用西格蒙德·卡尔·弗吕格的笔名写了一本才华横溢的政治讽刺作品《公元1903年》，在1904年出版时就被警察查封了，并且一直到1918年仍被列在禁书目录上。

尽管如此，在1914年以前的那些日子里，沙皇俄国西部的欧洲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气氛，奥地利也弥漫着这种气氛，并且现在看来似乎永远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维也纳大学因有许多真正出类拔萃的教师而有很程度的自由和民主。剧院也是如此，剧院在维也纳生活中是重要的——几乎和音乐一样重要。皇帝避开一切政党，并且不把自己和他的任何政府混同起来。的确，他彻底地遵循索仑·基尔凯郭尔给丹麦克里斯蒂安八世的戒律。⁽¹⁾

3. 早期的影响

我是在满屋书香的气氛下熏陶成长的。我父亲西蒙·西格蒙

德·卡尔·波普尔博士，象他的两个兄弟一样，是维也纳大学的法律博士。他有一个大藏书室，那里到处是书——他的餐室除外，在餐室里，有一架柏森多夫式的大钢琴以及许多卷巴哈、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尔伯和勃拉姆斯的作品。我父亲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同岁——我父亲拥有他的著作，并在这些书出版时就已读过。我父亲是一个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和法务官。至于我母亲燕妮·波普尔，母家姓施夫，我将在谈论音乐的时候更多地讲到她。我父亲是一个有才华的演说家，我听到他在法庭上辩护只有一次，那是1924年或1925年，当时我自己是个被告。依我看来，这个案子是再清楚不过的⁽²⁾。因此我没有请父亲为我辩护，可他坚持为我辩护，我深感为难。但是他那精练、明确、真诚的演说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亲对他的工作十分努力。他一直是维也纳最后一任自由派市长卡尔·格吕勃尔博士的朋友和伙伴，并且父亲接管了他 11 的法律事务所。这个事务所是我们居住的那座大公寓的一部分，它正好位于维也纳市中心，大教堂（斯蒂芬教堂）中门的对面。虽然他每天在这个事务所里工作的时间很长，但实际上与其说他是一个律师，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藏书室里有关历史的那部分书籍数目相当可观），尤其对古希腊时期以及18、19世纪感兴趣。他写诗，并且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韵文译成德文。（他很少讲这些事。纯属偶然的：有一天我发现荷拉斯的一些欢快的韵文的译文。他独特的天赋是明朗的风格和强烈的幽默感。）他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一直保存着他的柏拉图、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康德、叔本华，以及爱德华·冯·哈特曼的著作；由提奥多·贡佩尔茨（我的父亲高度评价他的《希腊思想家》一书）编辑的J.S穆勒选集的德译本；基尔凯郭尔、尼采、倭伊铿的大部分著作以及恩斯特·马赫

的著作；弗里茨·毛特纳的《语言的批判》以及奥托·韦宁格的《性别和性格》（这两本书似乎都对维特根斯坦有些影响）^①，以及达尔文大部分著作的译本（他的书房里挂着达尔文和叔本华的画像）。当然还有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和斯堪的那维亚权威作家的文学作品。但是社会问题是他的主要兴趣之一。他不仅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拉萨尔、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而且还有马克思的批评家：波姆·巴维克、卡尔·曼格尔、安东·曼格尔、P.A.克鲁泡特金以及约瑟夫·波普尔——林克乌斯（显然是我的一个远亲，因为他出生在科林，我祖父就是这个小城镇的人）的著作。藏书室还有一个和平主义的专架，上面有贝塔·冯·苏特纳、弗里德里希·威廉·福斯特以及诺尔曼·安格尔的书籍。

因此在我能够阅读这些书籍以前很久它们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学会阅读前不久，我母亲读给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我是三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听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伟大的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尔夫夫的一本儿童读物，德译本颇为优美《小尼尔斯·霍尔格森和雁的奇遇》；英译本名为《尼尔斯奇遇记》。许多年来，我反复阅读这
12 本书，至少一年一次；最后，我可能不止一次地阅读了塞尔玛·拉格尔夫夫所有的作品。我不喜欢她的第一部小说《古斯塔·伯尔林》，虽然这本书无疑是十分卓越的。但对我来说她其他的每一本书都是杰作。

学习阅读，以及其次学习写作，当然是一个人智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情。任何事情都无法与之比拟，因为，几乎很少有人（海伦·凯勒大为例外）能够记得学习说话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将永远感谢我的启蒙老师艾玛·戈尔德伯格，他教会了我三个R^②。

①即阅读、写作和记忆。——译者注

我认为，这些是必须教给一个儿童的唯一要素；有些儿童为了学习这些甚至不需要别人教。其余的就是气氛，以及通过阅读和思考去学习。

除了我的双亲、我的启蒙老师和塞尔玛·拉格尔吕夫以外，我认为对我早期智力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我终生的朋友阿瑟·昂特。他是拿破仑战争期间⁽⁴⁾，德国民族主义的著名奠基人之一恩格特·莫里茨·冯·昂特的一位亲戚。而阿瑟·昂特是一个热情的反民族主义者。虽然他是德国人的后裔，却出生于莫斯科，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他比我大二十岁，当我在1912年第一次遇到他时，他已年近三十岁。他在里加大学学习工程学。在1905年未成功的俄国革命中，他曾是学生领袖之一。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的强烈反对者。从1905年起，他就结识了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导人。他把他们描绘成社会主义的耶稣会教士，就是说，他们做得出牺牲无辜的人、甚至违背他们自己心愿的事来，因为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昂特不是一个坚信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认为马克思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发现我非常愿意听社会主义思想，而我覺得，没有什么能够比结束贫困更为重要的了。

昂特对恩斯特·马赫和威廉·奥斯特瓦尔德的门徒们发起的运动也有浓厚的兴趣（远远超过我的父亲）。这个团体的成员自称为“一元论者”。（与著名的美国杂志《一元论者》有联系，¹³马赫是这个杂志的撰稿人。）他们对科学和认识论感兴趣，对现在所称的科学哲学感兴趣。在维也纳的一元论者中，“半社会主义的”波普尔—林克乌斯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其中包括奥托·纽拉特。

我读的第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可能是在我的朋友昂特的影响下——我的父亲是不愿意影响我的）是爱德华·贝拉米的《回